

王应睐先生送我一本书 ——纪念王应睐先生诞辰110周年

王恩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上海 200031)

我的书架上珍藏着王应睐先生送给我的一本书——《治学之道》(图1)。扉页上王先生亲笔写着“送给王恩多同志”落款是“王应睐1993.8”(图2)。那时我刚加入王应睐先生的研究组不久。这本书是中国生理学会学术丛书, 记载着老一辈生理科学家的自述, 1992年10月由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书的纸张质量与现在的相比差很多, 黄而薄, 反面的字可以隐约透到正面。时隔25年, 书页已泛黄。这本

书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生理学家, 第二部分为生物化学家, 第三部分为药理学家, 第四部分为病理生理学家、营养学家和免疫学家。所有文章的作者, 现都已作古。但这本书记载着老一代科学家的“治学之道”, 因此十分珍贵。据我所知王应睐先生署名的这类文章不多, 但这本书收集了王应睐先生1985年发表于《生理科学进展》的署名文章《我是怎样选择生物化学作为终身事业的》, 所以格外珍贵。文章中, 王先生详细地讲



图1 王应睐先生赠送的书——《治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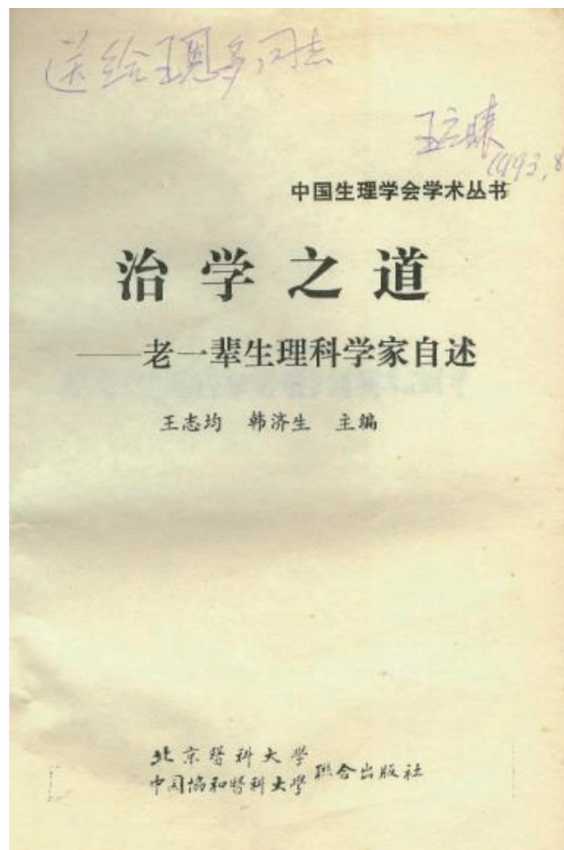


图2 扉页上王应睐先生的亲笔题字

*王恩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述了他1985年前的经历,从出生写起,入中学,进大学,1938年春获庚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45年回国后先后在前中央大学医学院、前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任所长等。记得当初王先生送我这本书时,我就仔细阅读过这篇文章。今日再读王先生的文章,仿佛他是在和蔼地、慢慢地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心有所感,我觉得应该写个读后感。

王先生从青年时代就是一位想着劳苦大众的人。他刚毕业时曾经患过肺结核,在书中写道“在养病期间曾广泛浏览关于肺结核病书籍,并时常思考如何解决我国肺结核病广泛流行的严重问题。当时结核病尚无特效药,而在北平(全国亦然)广大穷苦劳动人民中,特别是黄包车夫患病率特高,由于无力休养,死亡率也很高。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悲惨情况,难以描述。当时治疗途径不外休养与充足营养,而这两条正是穷苦劳动人民所无法解决的。这问题经常在我脑中盘旋,加上自己长久被病魔纠缠的体会,就决心放弃工业化学,改学生物化学,因为营养学是生物化学的一个内容,我在燕大进修时便着重学生化与营养。”这是王先生选择“生物化学作为终身事业的”初衷。

王先生是一个知难而上、善于解决科学问题的人。王先生留学英国时接到的第一个课题是微量测定各种食物及组织中的维生素含量,而他“所在的实验室设备简陋,连一台离心机、一架普通的光度计都没有,因此只能因陋就简,以最简单的理化学方法来完成任务。”在两年时间内,他克服了困难,“完成了四种不同的水溶性维生素的微量测定方法,有些结果并与生物测定结果作平行比较,证明其可靠性。”书中还提到“曾师从著名科学家、细胞色素发现者D. Keilin教授,研究豆科根瘤和马肚寄生虫血红蛋白和酶。这段经历对我归国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记得他多年前曾亲口给我讲过他从马胃寄生虫里提血红蛋白的故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凯林(David Keilin)教授要他分离马胃里一种寄生虫背部的一条“红线”,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这项工

作的程序是先刨开马胃,从中挑拣出小小的寄生虫;积累到一定的量后,才能挑这根“红线”;等红线积累到足够的量,才能从中提取血红蛋白。过去凯林教授也曾要其他人做这件事,但是其他人一方面受不了马胃中的难闻味道,另外工作量也太大,都找借口不做了。而他接了这个课题,知难而进,成功了!由于是第一次发现,文章发表在Nature杂志上。故事虽然简单,但我想当时的过程并不简单,要过味道关、挑寄生虫关、解剖寄生虫关、分离红线关……每一关都是一种挑战。尽管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轻描淡写了几句话,但是我知道做成这件事很不容易。没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绝不会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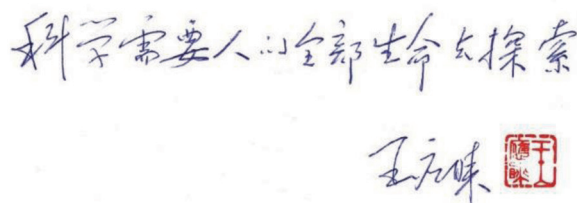
王先生是一个心系祖国的人,文中多处流露出他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在建立微量测定维生素方法时,他提到“我采取这一系列简易可行的方法,目的也是为回国后开展工作做准备。因当时国内研究条件不可能较英国好。”1941年王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由于战争回国的交通阻断,他留在剑桥大学工作,他写道“四十年代初期,所有主要维生素已先后被发现,有的已被合成,维生素研究的中心问题已转到其作用原理,特别是它们与酶和代谢的关系。欲深入研究,必须具备更坚实的生化基础和广泛的研究经验。同时我也逐渐认识到,营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知识问题;而结核病的解决更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社会任务,因此我决定利用剑桥的优越条件,充实自己的生化知识,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开展我国的生化工作。”王先生这样想,以后也的确这样做了。

王先生是一个全心投入中国生物化学事业的人。王先生在书中写道“新中国诞生后,医学所筹备处并入中国科学院,改名生理生化研究所,冯德培任所长,我为副所长,负责生化部分。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我国生物化学究竟如何发展。”他分析了学科的生长点,“认为我国生化必须紧紧围绕这门学科的生长点以带动全面。”他将研究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认为“首先必须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科带头人,形成骨干队伍。”他吸引了邹承鲁、曹天钦、张友端、王德宝、钮经义、沈昭文和周光宇等先生,在1958年初步形成

了一个不小的骨干队伍，并且成立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但是，只有将没有兵也不成战斗队伍。”所以王先生十分重视青年生化人才的培养。在王先生的带领下，研究所从建所初期起就多次举办高级生化训练班，后来拓展到举办“全国高级生化训练班”，使中国青年生化科研工作者迅速成长。除培训班外，生化所还协助大学建立了生化专业或生化系，培养了大批的中国的生化人才。王先生把吸引人才、稳定人才、培养人才始终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据我所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深感生化所科研人才不足，必需稳定已有的科研骨干安心在生化所工作，当时进上海需要“上海户口”，非常困难，许多科研人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他想方设法解决科研骨干的“两地关系”问题，稳定了不少科研骨干。“十年文革”生物化学人才断档，为了提高业务水平，生化所多次举办“全国高级生化训练班”，不少人得益于“训练班”。由于王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是怎样选择生物化学作为终身事业的》，所以他为中国生化事业做出的贡献没有全部写出，对他担任协作组组长完成的“人工合

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一项重大成果，他仅用一句话带过“领导人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1985年这篇文章在《生理科学进展》上发表时，王先生已经78岁了，他依然想着如何为中国生化事业出力，文章的结束语是：“退居二线以来，准备重新从事力所能及的研究，希望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的生化事业多尽一点力量。”

王应睐先生曾手书“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图3)。王应睐先生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中国的生化事业，他的名字将永载中国生物化学史册!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王应睐

图3 王应睐先生手书
“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